

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

曾国藩文选

钱仲联 / 主编

涂小马等 / 选注评点

开创湘乡文派

拓宽桐城堂庑



苏州大学出版社

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

钱仲联 / 主编

曾国藩文选

涂小马 [韩]崔泳準 / 选注评点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国藩文选/(清)曾国藩著;涂小马,(韩)崔泳
準选注.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9
(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钱仲联主编)
ISBN 7-81037-795-7

I. 曾… II. ①曾…②涂…③崔… III. 古典散
文-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I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0740 号

策划编辑 王英志

责任编辑 王英志

明 清 八 大 家 文 选 丛 书

曾 国 藩 文 选

钱仲联/主编 涂小马 [韩]崔泳準/选注评点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邮编 215021)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通州印刷总厂 (南通市交通路 55 号 邮编 226300)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15 千字
印 张	13.625 插页 2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81037-795-7/I · 28
定 价	23.00 元

编辑缘起与体例

王 英 志

中国明清之前的散文自明代古文家茅坤编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八家散文为《唐宋八大家文钞》之后，乃有“唐宋八大家”之称，影响十分深远。而有关唐宋八大家的文选从古至今已出版了不计其数。但遗憾的是唐宋以后明清的散文大家及其散文作品，却一直受到冷落，从总体上挑选、评价明清散文大家的工作，极少有人问津，建国后则更未见；而读者对明清散文从总体上把握、了解的需求却是客观存在的。为此，今仿效“唐宋八大家”之名，提出“明清八大家”，以与“唐宋八大家”相呼应；并编辑“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以与《唐宋八大家文钞》相配套。此丛书计划每一位明清散文大家出一册散文选本，组成一套“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八册。此套丛书大体上反映了明清主要散文大家的创作成就，可以开阅读者眼界，使之对中国古代散文有更全面的了解；同时亦可填补图书市场空白。应该说这是一套很有意义的古代散文图书。

编选此丛书的困难在于如何确定“明清八大家”人选。如今古代文言散文研究者固已相当缺少，而能写文言散文、能体味古体散文之三昧的专家，更难得其人。所幸年逾九旬的国学大师钱仲联先生尚健在。钱仲联先生不但对明清散文有精深的研究，而且自己能写作古体散文，深得其中奥妙，实为克服这一困难的最佳人选。故特邀明清诗文研究泰斗、博士生导师钱仲联教授斟酌圈定明清八大人选，力求使明清八大人选具有权威性、科学性，至

少可成一家之说，能为多数读者所接受。现经钱仲联教授反复考虑，确定明代刘基、归有光、王世贞，清代顾炎武、姚鼐、张惠言、龚自珍、曾国藩为“明清散文八大家”。此八大家的散文创作代表了明清不同时期不同文派的最高水平，亦反映了明清两代散文创作的主要成就。

丛书聘请钱仲联教授任主编，本人作为丛书的策划人及钱仲联教授的弟子，协助钱仲联教授负责具体操作，聘请、组织校内外明清诗文专家（多为从事明清诗文教学、研究的教授或文学博士）承担撰稿任务。每一散文大家入选作品篇目先由撰稿人草拟，再由钱仲联主编修订确定，使入选篇目能全面、准确地反映作家的散文成就与风格、特色。然后由策划人拟订编写内容与体例要求，确定样稿，供编写者参考，以保证丛书体例、规范的统一，提高整体质量。丛书的内容、体例大致如下：

一、每册书前皆有本“编辑缘起与体例”及钱仲联教授所撰丛书“总序”。

二、附图：每册书前附作者图像（个别阙如）、书法手迹各一幅，另附作者主要文集扉页（个别为封面或版权页）、正文书影各一幅。

三、目录：每册文章按写作年代先后或内容类别编排，年代不详者按文集卷数先后编排。

四、前言：着重介绍作者生平、思想、散文成就与地位，使读者对该作家有整体、全面的了解。

五、正文：采用简体字，加标点符号，文章酌情分段。注释序号采用小方括号，右上标，标在句末标点符号之前。文末注明文章出处。

六、【题解】：简介本文写作时间、缘起、背景，文章的思想内容等，附带注释文章题目中的难点，在下面的【注释】中不再注释题目文字。

七、【注释】：注释内容包括人名、地名、时间、职官、器物等的

解释,典故、引文出处等的说明,以及生僻词语的拼音(另加常见同音字)、解释。本书读者一般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因此词语注释忌琐细。着重注释冷僻难懂的文言词,以及古今意义不同的词语。

八、【评点】:“评点”是本书的重点内容,侧重结合文章思想内容用简练的语言对文章进行写作艺术的分析。就一篇文章而言,着重评点一两个写作艺术特色,不求面面俱到;但就全书而言,则体现多角度、多侧面,全面充分地反映该大家文章的思想深度与艺术造诣。

九、附录:书末附录关于古文大家的传记资料、评论资料,以帮助读者深入了解古文大家的生平与事迹以及文坛地位与散文特点,并附录撰稿者所参考的原著、选本、论著等文献名称,注明版本,为读者深入探讨提供线索。

此套丛书在各方面的努力下,终于问世,期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2001年1月于苏州大学



序

钱 仲 联

古文，又称古文辞。古文辞之名，早见于韩愈文集，故“桐城派”姚鼐所编古文选，名为《古文辞类纂》。古文辞，是区别于六朝以来的骈偶文章而言的，而韵文中的辞赋，姚选也列为一类，以区别于唐宋时代和以后应试用的非古式的律赋。姚选本不选录律赋。

姚鼐选本，所包罗的家数极多，作家的时代，上及先秦，下迄清代桐城派的刘大櫟。属于唐宋的，则以所谓“唐宋八大家”为主体，入选的文章特别多。

“唐宋八大家”之称，最早出现的，为明后期的“唐宋派”古文家茅坤所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八大家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而据《四库全书总目》所云：“明初朱右已采录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之作为《八先生文集》，实远在坤前。”继“唐宋八大家”之后，又有所谓“金元明八大家”之目，清人李祖陶编有《金元明八大家文选》五十三卷，其书仅有原木刻本，流行不广。现在苏州大学出版社另起炉灶，计划选录明清两代古文，也以八大家为代表，取它可以继踵“唐宋八大家”，而不见逊色者，以之嘉惠士林，使后继者能以少总多，从中取得借鉴，以达到创新之目的。

那么，入选哪八大家呢？

首先考虑到的，是八家散体古文，必须是卓越杰出的，代表明清两代各种主要文派的，必须是学问高深，儒林文苑，人们一向仰为山斗的；然后，来一个结集，让读者惬意当意，可以认同。

因此，我们在明代先选了刘基。刘基政治、道德、文章，在明初

首屈一指，较之同时之宋濂，实为过之；故取以冠明代。继之为归有光，为明代“唐宋派”古文家之旗帜，姚鼐早已选入《古文辞类纂》，大家当然是首肯的。明代在文坛长期主盟的是前、后七子，他们是远宗秦汉的，唐宋不在话下。然而后七子中的王世贞，实在是一位饱学之士，后期他写古文，也包含唐宋家法。他的《弇州山人四部稿》《读书后》等，佳构纷呈。归有光曾讥他为“妄庸巨子”，他笑说：“妄则有之，庸则未也。”后来他为归有光作赞，称“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又可以见到二人异途同归的实质。明代取此三家够了。汤显祖在词曲领域称雄，不必以古文与三家争长；其他如公安、竟陵，则成就更小。

有清一代，首取顾炎武。顾氏不但学术为一代开山，古文亦雄厚无敌，清初三大儒，黄宗羲、王夫之，俱逊炎武：黄氏文杂；王氏以《读通鉴论》著名，旨在借题发挥，为反清服务，范围较隘，故不录取。清初旧有所谓“三大古文家”者，指侯方域、魏禧、汪琬三人。侯氏虽工文，晚节不终；魏禧遗民，古文则难压倒时人；汪琬局面更小。故这里亦不选入。接着是姚鼐，代表“桐城派”，其文清窈高远，桐城派方苞、刘大櫆，都不及姚。王先谦、黎庶昌两家《续古文辞类纂》，都大量选入姚氏之文。接着是张惠言，代表“阳湖派”，惠言是学人，以“虞氏易”名家；又能为古赋，词为“常州派”宗祖，可谓一专多能。接着是龚自珍，是个不立宗派的大家，经史兼长，经则古文经学派与今文经学派兼长；文辞特多创新，言皆有物，影响晚清文坛，至为深远。接着为曾国藩，开创“湘乡派”，拓“桐城派”堂庑而大之，曾门四大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则包办了晚清古文事业。

以上五家，作为清文代表，可谓文坛之五岳，合之明代三家，以上继“唐宋八大家”，譬如积薪，后来居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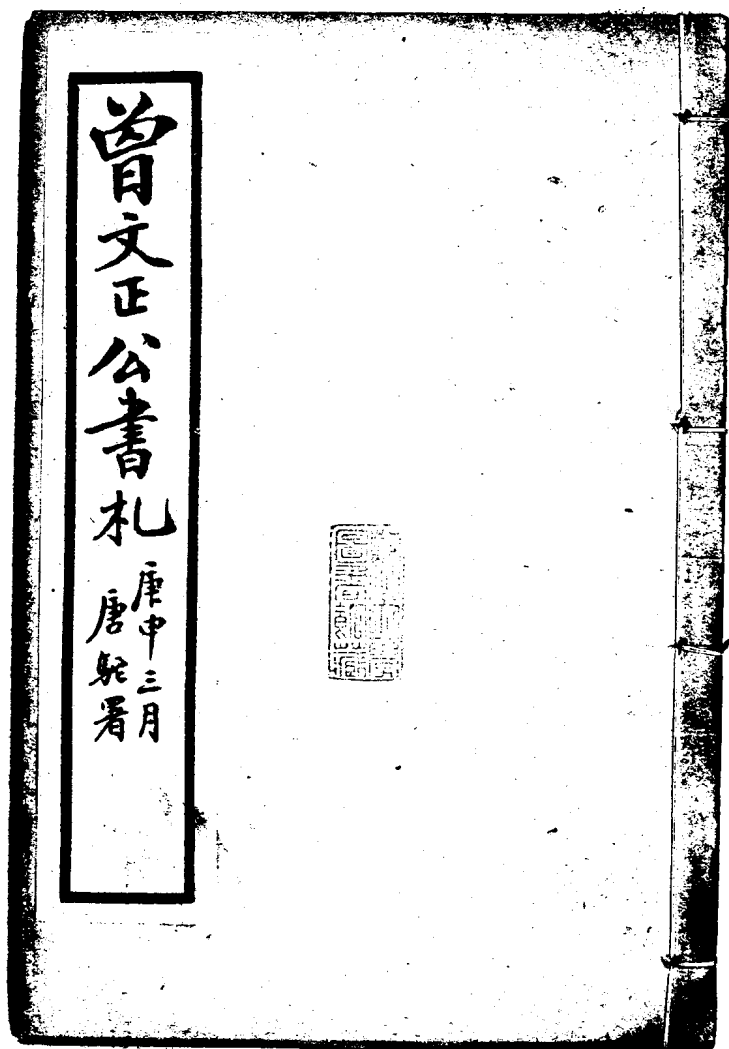
至于对“明清八大家”的评论、介绍，都详于各家选本的前言中，我就不再饶舌了。

2000年11月于苏州大学



曾国藩画像(清内府原藏)

衛生仁兄大人閣下月杪接奉
惠書獎借溢量伏增悚汗敬維
勛望崇闕與居多祉良為頌慕歲
湘人援鄂要艱之供有求必應第眾誦
德至今弗緩比渡
桂藩楫建內當民外而遏寇
風猷峻逆政想何窮承



《曾文正公书札》封面(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印本)

曾文正公書札卷一

覆賀耦庚中丞

國藩頓首頓首耦庚前輩大人閣下。二月接奉手示兼辱雅贐。感謝感謝。過蒙矜寵。獎飾溢量。國藩本以無本之學。尋聲逐響。自從鏡海先生遊稍。乃粗識指歸。坐眚見明。亦耿耿耳。乃甫涉向道之藩。遽釣過情之譽。是再辱也。蓋嘗挾剔平生之病源。養癰藏癰。百孔雜出。而其要在不誠而已矣。竊以爲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爲之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今之學者。言考據則持爲騁辯之柄。講經濟則據爲獵名之津。言之者不忤。信之者貴耳。轉相



前 言



—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其远祖在武城县(今属山东),第六十二传曾孟学始迁居湖南湘乡大界。曾国藩属迁大界后之第九代。曾氏自迁湘乡后,累世力农,家境贫困,数代“勤俭立身”“耕读保家”的家训,对曾国藩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曾国藩的祖辈虽有粗识文字者,但并无一人参加过科举考试。祖父曾星冈深以自己荒废了少年时代的大好读书时光为耻,决计让子孙多读书,尤其对长子曾竹亭寄予厚望。遗憾的是,曾竹亭经过十六次童子试,都名落孙山,直到四十三岁那年才考中秀才。但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曾氏迁湖南以来五六百年中的第一个秀才,这也使得屡经挫折、自知才短的曾竹亭有信心将光大门楣的希望寄托在国藩、国潢、国华、国荃、国葆诸子的身上。曾国藩生长在这样一个典型的耕读世家,勤俭、礼教,以及父祖两代追求功名的渴望,都深深地烙

在他的心灵之上。五岁开始识字读书的曾国藩，一年以后就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就读于父亲执教的家塾的学习生活，背诵《四书》“五经”，学习《史记》《文选》及其他书籍，而习作八股文等，也是曾国藩致力的方向，这一切都是为参加科举考试作准备。曾国藩二十岁时带着弟弟国潢到外地求学，两年后应府试，中“背榜”（末名）秀才，终身以此为耻。1834年冬，曾国藩至京城参加会试，虽然连续两次的会试与恩科均未考中，却使这个生长山村的寒门士子眼界顿开。在京期间，他潜心攻读了韩愈的古文和大量的经史书籍，南归还乡途中，又用借贷和典当衣物的钱在江宁买了一部“二十三史”，回家后闭门苦读一年，且泛览百家，为日后广泛进行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1837年冬，曾国藩再次离家赴京会试，终于中第三十八名贡士，殿试获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一等第三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1840年庶吉士散馆，列二等第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自此开始了为期十二年的京官生涯。

曾国藩的京官生涯是一帆风顺的。曾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擢礼部右侍郎，历署兵部、吏部侍郎。曾氏好直谏言事，在京期间，先后上《遵议大礼疏》《议汰兵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颇得咸丰帝的赏识，认为“剴切明了，切中情事，深堪嘉纳”。1852年7月，受命为江西乡试正考官，在赴任途中得知其母江氏去世的消息，于是改道回乡奔丧。1853年1月，奉咸丰帝谕旨，帮同办理湖南团练。曾氏身为团练大臣，但并不相信团练武装真能发挥镇压太平军的作用，于是有募勇成军的想法。1854年，湘军练成，齐集湘潭，水陆兵弁共一万七千余人。湘军初出师便大败于靖港，但不久却攻陷湘潭，旋即占领岳州，并出省作战。湘军与太平军在长江中下游长期作战，相持不下。1860年8月，清廷授曾国藩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11月，奉命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1862年受命为协办大学士。1864年，湘军攻占天京，最终击败太平天国。曾国藩亦因而加太子太保，封

一等侯爵。1865年7月进剿捻军,但无收效,遂于1866年12月回两江总督原任。1867年授大学士,次年调任直隶总督。1870年6月,发生天津教案,曾氏在奉命查办、审理此案的过程中,遭到朝野各界的责难。9月,又调任两江总督,12月,抱病到任。1872年3月,病死南京,终年六十一岁,谥文正。

二

历来对曾氏古文所属派别或地位问题颇有争议,我们认为,曾国藩对桐城派的学习与继承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一,桐城文风对当时直至五四以前习古文辞的人都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就是抗拒或背弃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因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来逃避或矫正他所厌恶的风气。”(《中国诗与中国画》,《七缀集》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而桐城派对曾国藩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点同时或稍后的人都有记载,如姚永朴就说:“昔永朴先考慕庭府君尝言,吾乡戴存庄孝廉入都,曾文正讯古文法,存庄以《惜抱轩尺牍》告之,文正由是益肆力文章。”(《文学研究法·工夫篇》)曾国藩也直认不讳,他多次称述方苞“古文号一代正宗,国藩少年好之。”(《曾文正公家书》卷七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致沅弟)“国藩之粗解文字,由姚先生(按指姚鼐)启之也。”(《圣哲画像记》)“桐城姚姬传郎中鼐所选《古文辞类纂》,嘉、道以来,知言君子群相推服。谓学古文者,求诸是而足矣。国藩服膺有年……”(《曾文正公杂著》卷二《古文辞类纂正误》)。

第二,曾国藩的文学主张也有继承桐城派的地方。在《〈欧阳生文集〉序》一文中,曾氏用简练而清晰的笔墨描绘了桐城派的来龙去脉,历叙“姚门四杰”之后的师承关系,并评论道:

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摭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道之废兴，亦各有时，其命也欤哉！

实际上，曾国藩文论较为重要的两个方面都源自姚鼐。上文称引的姚氏主张的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兼长相济，到了曾国藩手里，虽然增加了“经济”，但基础仍然是姚氏的主张。曾国藩说：“有义理之学，有辞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辞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予于四者，略涉津涯，天质鲁钝，万不能造其奥突矣，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从事，庶以渐磨之久，而渐有所开。”（《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二上《问学》）四者之中，他尤其强调“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辞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曾文正公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诸位老弟）“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曾文正公杂著》卷四《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姚鼐将文章的风格分为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曾国藩则说：“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

第三，曾国藩与当时桐城派传人来往密切，而且颇多赞誉之辞。比如梅曾亮在姚鼐逝世后，以嫡传弟子的身份名重一时，曾国藩视之为桐城正宗而与交游切磋。正如后期桐城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马其昶所说：“曾公论文，私淑方、姚，而友梅氏。”（《濂亭集》序）曾国藩还经常登门求教，“悉以所业来质，或从容谈宴竟日”（朱琦《柏枧山房书后》）。在《曾国藩全集》中，对梅曾亮表露仰慕之意的地

方很多,如说:“阅梅伯言(指梅曾亮)文集,叹其钻研之久,工力之深”(《曾国藩日记》壬戌九月)。梅曾亮长曾国藩十五岁,他们生活的时代,正是国家的命运与桐城文运急剧转变的时代,如何使文章与时运紧密联系起来,适应时代的变化,梅曾亮最早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他说:“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运会所移,人事所推演,而变异日新”(《答朱丹书》)。至于具体如何操作,梅氏的认识模糊,未作理论性的概括。曾氏则亮出“文章与时变相因”(《〈欧阳生文集〉序》)的旗帜,在理论上受梅氏影响并较之前进了一大步,将改良主义的“经济致用”的口号放进了“义理、考据、词章”中,用此来挽救桐城文风的窳弱之病。从而为习古文者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除梅曾亮之外,曾国藩还与大批古文家和古文论的倡导者有密切的关系,而其中不少人物恰恰是继承桐城派的衣钵。如朱琦、龙启瑞、冯志沂、孙芝房、刘淑云等人,实际上这些人都与梅曾亮有着密切的交往。

三

曾国藩早年虽然取法桐城派,与桐城派沾染甚深,但在理论和创作实践方面对桐城派又加以修正和改造。大致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以“经济”药救桐城派文章空疏之病。

上文谈到曾国藩重要的文论主张来源于姚鼐的“义理、考据、词章”之说,然而,曾氏增加了“经济”,四者相并,以与孔门四科相比。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治学风气也由乾嘉时期的“纯学术”转变为道咸时期的“致用之学”,这一转变的标志为魏源、贺长龄修纂的《皇朝经世文编》告成(参见葛荣晋主编《中国实学思想史》下卷第三十三章,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该书刊行后,最先受风气影响的是湖南人:“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也无怪乎数十年后“中国变法